

阿来专访：

阿来：没意思，不说话

□ 李文

又一次漫长的出差之后，阿来回到成都的家。首先迎接他的不是接风洗尘，而是牙医的钳子。66岁的他一口气拔掉了三颗坏死的牙齿。

以文字为生的作家说不了话，有点像他的小说《尘埃落定》里的二少爷，观者喧嚣，在脑海中构建一个庞大的世界，然后沉默。

往年这个季节，阿来都会进山，因为山上的花开了。但是今年的4月和5月，他错过了花期。他的行程被排得满满的，马不停蹄在全国参加各种活动，往往只来得及回家换一身衣服，又被催着赶路。

4月，他的新书《大河源》出版，这是他用两年时间重走青海河湟地区后写的非虚构随笔集。他在后记中说，写此书的目的“是为黄河源立传”。“知所从来，为的是知所从去。”他说。

样出身贫寒，四处游历中感受美国；后者更厉害，把整个拉丁美洲都当成自己的故乡在写作。

瑞典汉学家、翻译家陈安娜一直非常喜欢阿来的短篇小说，认为其中有一种特殊的安静，一种寂静，一种梦幻迷离的特质，“他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同的中国”。

阿来的母语是藏语，上学后才开始学习汉语。小时候，阿来经常做一种噩梦。看不懂算术符号像立体的泡沫一样从天而降，

压在身上喘不过气。直到小学三年级，脑子里“嗡”一声顿开，所有不懂的“主义”和“概念”都懂了，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汉语世界。

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没有考上自己最想去的地质学校，读了县里的师范中专，毕业后成为乡村教师。20多岁的他书教得好，在县城很有名，当上了阿坝州政协常委。偏远县城的生活是贫瘠的，阿来只能沉溺于阅读和音乐中。

1982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诗歌《振响你心灵的翅膀》，署名“杨胤睿”，杨是他的回族父亲的姓。诗越写越长，他开始写小说，署名变成了“阿来”。这是他的藏族母亲起的名字，意思是“刚出土的麦苗”。

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血脉》里，有一个拥有“多吉”和“亚伟”两个名字的少年，从小感受到身份撕扯的痛苦，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少年多吉自嘲，自己是少数中的少数，“有点像家乡一带食箭竹为生的熊猫”。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尤其喜欢阿来的这篇小说，认为它“潜藏有阿来以何写作与何以如此写作的渊源”。在她看来，正是只能作为口语运用的母语藏语和习得的作为书写的语言的汉语，使得阿来的小说烙印着深刻的个人印迹。

1989年，阿来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那一年，他30岁，突然开始思考一些离日常生活很远的概念：国家、民族、社会和自我。一次参加贡嘎山的活动之后，返程中，他突然不想再回成都，因为回去又是到作协开会。

他把皮鞋脱了，换上现实的旅游鞋，顺着大渡河往上游走。一双鞋走坏了，就再买一双鞋，漫无目的流浪了一个月。

那时，他白天看宁静的花草，晚上读残酷的土司历史。他随身带着一卷聂鲁达的诗歌集，骑马和徒步都背在背上。他喜欢那样的风格：宽广、舒展、雄壮，任何时候都不被令人悲伤的事实所压倒。那不是简单声张的乐观主义，而是出于对人性与历史的信仰。

途中，他写下了长诗《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漫游回来后，他在香烟盒上写完最后一章：

“我在这里，我在重新诞生，背后是孤寂的白雪，面前是明亮的黑暗。啊，苍天何时赐我以最精美的语言。”

他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与这片土地的血脉联系，也对那些深植于土地、充满原始生命力的故事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他开始调查18家土司的所有历史，以至于后来比土司家族后代还讲得更清楚。他不仅研究制度，还实打实考据生活的细节：器具、服装和饮食。

1994年春天，他开始写作《尘埃落定》，写到冬天白桦树的叶子掉光。书稿完成后，辗转于出版社之间，屡屡遭拒。他不肯修改，说“除了错别字，别的不改”，也不肯带着小说去北京“拜山头”。他相信，这部作品自会有出头之日。

“文化商人”

那时，一条意想不到的路径摆在阿来面前。他被借调到《科幻世界》杂志当编辑，一年后，他升任主编，后又当了社长，成为一个“文化商人”。手下的人经常跟他说，我们应该为读者考虑，为读者服务。阿来生气了，把编辑拉到落地窗前，指着成都人民南路高楼大厦下的人群说：“14亿人，我们的订阅读者是40万，那么你来，这些人中，谁是我们的读者？”

阿来坚持认为，不应拿“读者群体”这个模糊的概念来规制杂志的发展方向，相反杂志可以通过自己的审美来引导读者。他把阿西莫夫、卡尔·萨根等科幻学大师的文章介绍给了青少年读者。科幻作家韩松认为，阿来时期科幻创作的文学性得到了增强。在阿来主持下，《科幻世界》的发行量从1998年的20万册，攀升至1999年的30万册，2000年突破40万册。

1998年，阿来的《尘埃落定》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首印后引起轰动，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公布期间，阿来正在南京的全国书展上摆摊，推销自己的杂志。

在《科幻世界》的十年，阿来成功将一本杂志推向了巅峰，见识了巨大的现金流和商业世界的运作逻辑。但他却经常觉得“没意思”，厌倦那些冗长的会议，有时借故离场，出去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最终，他选择了离开。

2009年，他出版了小说《空山》，又名“机村六部曲”（修订再版时改为《机村史诗》），记录了一个名叫“机村”的藏族村庄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近半世纪的社会变迁。阿来说，这半个世纪，中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从政治到经济。他自己所出生的偏远村庄也经历了这些深刻的涤荡和变化。

他认为，很长时间以来，对很多人而言，但凡关涉少数民族生活的书写，就只是提供了一个多样性文化样本，具有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他

想表现的是，机村虽然是一个藏族村庄，但不是一个异族文化样本。看起来具有强烈特殊性的机村，其实蕴含着更多的普遍性。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天下观”。

“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

阿来身上似乎始终有一股“拧劲儿”。

25年来，“尘埃落定”这个成语经由他的小说进入人们的日常语境，似乎也成为围绕着他的一个难以打破的“魔咒”。

在看到《尘埃落定》的清样后，知名文学评论者李敬泽为素不相识的阿来写了一篇书评《为万物重新命名》。在那本书里，他看到了阿来的野心。前两年，在一次公开活动上，当被问到如何评价这本书在现代文学中的排名，已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的李敬泽说：“至少现在我可以差不多有信心地说，如果倒过来让我给1998年产生的作品排一个序的话，我能评出来第一名，那就是《尘埃落定》。”

这部小说被翻译成16种文字，其中不乏希伯来语等小语种。彼时文学界普遍将西藏视为一个神秘的异域符号，《尘埃落定》获得了诸多西方出版社的青睐。德国老牌报纸《南德意志报》评论，该小说把我们深深吸引到一个古老的世界，闻所未闻的残暴场面与对景色和女性的诗意描写交相辉映。

很长一段时间，阿来必须不断地谈“二少爷”的故事。他曾经抱怨，自己又“生”了好些孩子，说老实话有些还更好，但是大家觉得阿来写的就是《尘埃落定》。

有一年，《朗读者》节目邀请他做嘉宾。阿来请求，能不能选《机村史诗》的片段，甚至可以读别的作家的作品，然而节目组最后还是让他读了《尘埃落定》节选。

英文版《尘埃落定》（译名为《红罂粟》）的出品方准备预付高额版税，只因为他甚至还没动笔的续集，但阿来拒绝了，因为“没意思”。从此，他再没写过透支其家的二少爷、罂粟花和那片土地上的战争。

《尘埃落定》现在的读者大部分是年轻人，比阿来期待的年龄层都要小，他们喜欢那种瑰丽宏大的场景，以及绝对的理想主义。一些成年读者则更喜欢阿来后面的书，比如为了纪念汶川地震十周年写的《云中记》，或者以广袤乡村为题材的《机村史诗》。

阿来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全职作家。“法国有个哲学家叫德里达，说现在有一种书写叫‘意义的空转’。发动机运转起来是为了驱使汽车往前走，但是今天我们有很多书写却无法驱动前进。”阿来说。他认为，意义来自新的方法，来自细致入微的观察。他现在的心态就像一个种庄稼的农民，在做一双鞋子或造一座房子，缓慢而微小，但感受是真实的。

他曾为虹影的小说《饥饿的女儿》作序，序中说：非虚构文学为何开始越来越多被有思想的读者喜欢，也许是虚构的文学正在大面积地从现实撤退，尚未撤离者也正以中庸的温情和精致的美学遮掩了我们共同经历过的生活的残酷与艰难。

阿来的办公室里并没有奖杯和奖章，墙上有一个相框，里面是媒体对他的一篇访谈报道，标题是《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这是藏语中一句祝福语，意思是一生都在路上行走。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25.6.23)

小说的生命力在于写人心

——评罗伟章小说集《世界上的三种人》

□ 李燕

罗伟章的中篇小说集《世界上的三种人》，其中的同名小说开篇就引用漫画家朱德庸的一句话：“世界上的人共分为三种性别：男人、女人和岳母。”故事由岳母展开，自己婚姻的失败、对女儿过度的掌控及因此产生的家庭伤痛，在罗伟章的笔下勾勒而出。

全书里，有对立也有共生，有折磨也有成全，一个个中国式亲密关系摆在读者面前，如此真实，写出人心又直击人心，有些让人猝不及防。

从《姐姐的爱情》《我们的路》《大嫂谣》到《饥饿百年》《尘世三部曲》《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再到《世界上的三种人》，罗伟章的小说创作，不是横空出世，也不仅是厚积薄发，更似带着绵绵的蓄力，如涓涓细水长流向前。

《世界上的三种人》聚焦爱情、婚姻和家庭，看起来都是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主题，但在罗伟章这里，看似简单的故事娓娓道来，给人熟悉中的陌生感、观察里的距离感，点到为止又见人心的多种变化。

呈现生活最真实的模样，揭开人类情感的隐秘部分。

《世界上的三种人》收录了5个故事，其中3个的主角是作家或媒体人。似乎罗伟章都在从自己或身边的生活里拉开小说写作的帷幕，每个故事里也好像都有自己的一点点影子，呈现生活最真实的模样有了逻辑的基础。

即便《戏台》的主角是中小企业主和表哥纪军，《河湾》的主角是几乎与世隔绝的乡村男光棍和逃落而来的女人，但在虚构的故事里，仍然因为大量的生活细节而呈现出真实感。全书里最奇幻的《河湾》，女人因什么事逃来，又是什么原因悄然离开？在男女之间最直接、最纯粹的情感中，真实的细腻被制造出来，平息悬疑的同时让人获得阅读的满足感。

当然，罗伟章绕不过人类情感的隐秘部分。在《世界上的三种人》里，岳母与岳父婚姻失败的秘密；在《戏台》里，姨母下乡生病和房产争夺中，姐夫来叻了，癌细胞消失的秘密；在《影像》中，来自老家那神秘而可怕的谣言；在《河湾》里，迷一样的女人……这都在情感隐秘的范畴，被罗伟章的叙事逐个揭开，或能拼凑出完整的答案，或能一知半解看出端倪，小说的魅力也渐次散发。

底层叙事、地域书写与意识独白，构成罗伟章小说创作的个体路径。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在《世界上的三种人》中，5个中篇小说无一不包含了作者对故乡的书写和眷恋。罗伟章说过，故乡的山水、历史和人文立定作家的根基，也成就作家的想象。

哪怕是在第一个同名小说里，田应丰最后接纳了永远的岳母，但他对多年前的3位室友“寂寞而温暖地想念”，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故乡抑或说地域寄托。

在《戏台》中，姨母下乡的地方，即姨父的老家，《影像》里中年夫妻的老家，《现实生活》中我和胡坚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老家，都无一例外是地域书写。而《河湾》更是书写了一个极具特色的河湾地域。加上罗伟章对地方语言的运用，使每篇小说像是从地里生长出来的，带着乡音。

底层叙事是罗伟章小说的主要特点之一。没有宏大的人物设定，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件，而是从普通人和平凡生活入手，在琐碎的叙事中照见人类社会的底层常态：困境、挣扎、不甘和伤痛。

岳母造成女儿不幸流产的痛苦（《世界上的三种人》），姨母在嫁给姨父时怀有他人孩子的人生心结（《戏台》），小妹闺蜜商晴的“背刺”（《影像》），女人“做一辈子农妇吗？我将死在这里吗”的纠结（《河湾》），“我”对胡坚当年的崇拜和现

在鄙夷、关心混杂的情愫（《现实生活》），都构成罗伟章小说的内容特色要素。

罗伟章小说创作的个体路径上的另一亮点，是意识独白。他的所有故事的主角，都有相当笔墨的心理描写，有点意识流的痕迹，但以内心独白的主要形式表露在字里行间。

这些描写金句迭出，带着哲思的痕迹，侧面牵出故事与情绪。可以感知到，作者投入了情感在创作，又保持了必要克制的距离。整体上看，意识独白的融入与运用，丰富了小说的人物形象和故事的颗粒度，并成为罗伟章小说的一大特色。

解剖中国式亲密关系，表达对现实和人生始终如一的关切。

《世界上的三种人》是在讲中国式亲密关系，和丈夫妻子，和姨父岳母，和表哥，和闺蜜、和朋友圈同事等。关系上的亲密，不代表一直是快乐的，更不代表矛盾冲突、背叛成仇、嫉妒中伤，类似的人类负面情感不存在、不产生。

做过4年中学语文老师的罗伟章，想来是擅长带领大家做阅读理解的。透过5个中篇故事，我们应该可以从虚构中看到真实亲密关系的讲述与剖析，更从故事里看到每个人心底的隐秘。

罗伟章是讲故事的高手，在《戏台》中，我们家和姨父家散了，但两家都有属于自己的胜利；在《影像》里，谣言还在我和小妹要继续的黑暗中进行；在《现实生活》中，“我”说出所谓的真相，胡坚却已变成“站着走路的人”；在《河湾》里，第二天清早，女人消失了。每一篇都引发读者的好奇，每次收尾也给出了想象空间。

中国式亲密关系的开始和过程各有不同，甚至看起来结果也不一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都得经历和接受。在《世界上的三种人》里，女婿最终明白，不管怎样争吵，岳母还是岳母，亲密关系就在那里。人心深难猜不透，世态炎凉看不穿，也正因此如此复杂多面，值得以文学的形式挖掘其中的可能性与多样性。

罗伟章曾经很谦虚地说：“我只是把这些散落在人间的片段收集起来，用文字编织成了故事。”其实，自踏入文学世界的那一刻起，他对现实和人生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关切。从作品审视和文学表达里能看到，罗伟章抓住了小说创作的生命力所在——写人心。

2019年，在杨存辉老师的引荐下，怀揣着忐忑与期待，带着我刚出版的现实主义题材长篇小说《归途》，第一次踏上拜访著名作家王火前辈的道路。

那天的雨纷纷扬扬，似是为此个特别的日子添上一抹诗意的朦胧。怀着满心的崇敬，轻轻敲响王火前辈家的门。门缓缓打开，其女儿王凌热情将我迎进屋内。客厅里，老人家正笑盈盈地坐在沙发上，他一头整齐的银发，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浅浅的皱纹，却掩不住他眼眸里的熠熠神采。看到我进来，他微微欠身，向我招手，那温和的笑容瞬间驱散了我心中的紧张与拘谨。

“快坐，快坐！”王火前辈的声音略带沙哑，却透着十足的亲切劲儿。我在他身旁坐下，与他分享着创作《归途》的心路历程，诉说着自己对拐卖妇女这一社会痼疾的关切与剖析。在讲述过程中，谈到走访那些受害妇女时的所见所闻，她们眼中的恐惧、绝望与无助，让我深感痛心，也更加坚定了我通过文字发声的决心。王火老师听得认真，不时点头，还会就一些细节提出问题，引导我进行深入地剖析，并给予我诸多宝贵的建议。他说，文学作品不仅要展现现实的残酷，更要在其中注入希望，让读者看到人性的光辉，看到改变的可能。王火前辈还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经历。他回忆起年轻时，为了写好一部反映抗战时期的作品，曾深入多地地进行实地考察，走访了无数的抗战老兵和普通

百姓，收集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他说，文学创作需要扎根于生活，只有真正去感受、去体验，才能写出有血有肉、打动人的作品。他的这些经历，让我深受触动，也让我明白了创作背后需要付出的艰辛与努力。不知过了多久，我起身告辞，心中满是不舍。王火前辈起身送我到门口，再次鼓励我坚持创作，为文学事业贡献力量。

此后的日子里，我继续在文学的道路上摸索前行。某天，风

听着王火前辈的话，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作为一个文学新人，能得到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学大家的鞭策和鼓励，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我连忙说道：“王老，我就是觉得这样的社会问题太重了，想通过文学作品让更多人聚焦。但我还有很多不足，怕写不好……”

“年轻人，不要怕！”王火前辈爽朗地笑了起来，“谁都不是一开始就会写的，我也是一步步摸索过来的。有想法就大胆去写，有困惑就多思考、多请教。文学创作的路上，没有捷径，但只要坚持不懈、百折不挠，总会有收获的。”接着，他的语气变得更加温和：“你以后如果到成都来开会，就来我家里住宿，不要去住宾馆、酒店。我家里房间多着呢，住着也自在。”说到这里，他又幽默地补充道，“你放心，我不会让你为我做

饭、拖地的！”我忍不住笑了。挂断电话后，我静静地坐在窗前，回想着和王火前辈的每一句对话。他的关爱与幽默，都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位文学前辈对新人的关怀，更像是一位长辈对晚辈的疼爱，让我倍感珍惜。而想起那次错过的合影，遗憾中又多了几分对再次见面的期待。

跟王火前辈的交往逐渐让我意识到，文学于我，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星辰，而是掌心真实的温度。它让我看见生活纹路里的光亮，听见无数个无声的故事在笔尖流淌。我知道，在这条没有尽头的路上，还有更多年轻的身影正在涌现。那些温暖过我的光芒，终将化作漫天星火，照亮更多人的归途。

文学之光，温暖前行之路

□ 龚良红

和日丽，我正打算出门走走，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居然是王火前辈的来电！我的手微微发颤，赶紧接通。听筒里传来王火前辈略带沙哑却依旧温暖有力的声音：“小龚啊，这两天读了你的长篇小说《归途》的前半部分，拐卖妇女这样残酷的现实，确实需要有人去书写、去揭露啊！”他顿了顿，缓缓说道，“长篇小说，就应该有这样的担当，要敢于直面生活中那些令人感动、深思甚至痛心的现实。只有把这些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才能引发人们的重视，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本版责编：崔耕